

张静如先生对李大钊研究的开拓和创新

吴汉全

(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1815)

摘要:张静如先生是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张先生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一以贯之地坚持李大钊研究,在李大钊研究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李大钊生平活动与思想体系、李大钊研究史、李大钊研究的新领域开辟、李大钊研究国际化以及培养李大钊研究后备队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先生从事李大钊研究有着丰富的学术思想,张先生李大钊研究的丰富学术思想包括:知世论人、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研究理念;学科交融、视域宽广的研究视角;加强基础、还原本真的学术追求;总结得失、不断开拓的治学风格。张静如先生对中国李大钊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开拓与创新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张静如;李大钊研究;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5-0016-13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5.002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the Study of Li Dazhao by Mr. Zhang Jingru

WU Han-quan

(College of Marxism,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Mr. Zhang Jingru, the founder, leader and organizer of the study on Li Dazhao in China, devoted himself to his research into Li Dazhao in all his academic career. H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Li Dazhao, Li Dazhao's life, activities and ideological system,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Li Dazhao, new fields of the research of Li Dazhao, the internationalized research of Li Dazhao and the training of researchers of Li etc. The rich academic thoughts from Mr. Zhang about the study of Li Dazhao include: the spirit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understanding human beings and reflecting on society, the concepts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bringing the new thoughts into the ol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characterized by discipline combination and broad horizons, the academic pursuit of strengthening basic sciences and restoring the truth, the academic style of summarizing the pros and cons and constant development. Mr. Zhang Jingru made a promine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Li Dazhao in China.

Key Words: Zhang Jingru; the research of Li Dazhao;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张静如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共党史研究大家,中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在中共党史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现

当代社会史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大钊研究是张先生一生中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重点研究领域,被称为“李大钊研究第一人”。2003年,在张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 2012 年重大招标项目(12&ZD108),2014 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男,江苏大丰人,博士,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静如先生70华诞之际,《中共党史研究》曾以“本刊专稿”发表了笔者撰写的《张静如与中国的李大钊研究》一文^[1],对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方面的成就作了初步概括。在张先生仙逝之时,笔者撰写此文,旨在梳理张先生一生李大钊研究的学术贡献,总结张先生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思想,弘扬张先生的精神和其开创的学术事业,以此寄托对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研究李大钊的学术历程

张静如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李大钊的研究工作,一直身体力行地耕耘在李大钊研究的第一线,他亲自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李大钊研究学术研讨会,领导李大钊研究者不断开拓新领域,使李大钊研究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张先生研究李大钊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这是张静如先生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奠基与开创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张先生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以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这就是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对于这本书,张先生曾经这样回忆:“1954年初,北师大让我去北京大学哲学系跟苏联专家萨坡什尼柯夫进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北大后,我除听课、自学原著外,就去图书馆翻阅报刊,想学完哲学后仍搞中国革命史。一年后,苏联专家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论文,参加副博士答辩。……题目确定后,教研室又安排指导教师石峻负责我的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奋斗,论文写出来了,参加答辩。这次答辩阵势很大,除苏联专家外,冯友兰、金岳霖、郑昕、张岱年、任继愈等都参加了。……可是,由于国家学位制度没有批下来,副博士(即硕士)学位也就吹掉了。论文经过整理,交给出版社,没多久就出版了。”^{[2]827} 张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国内外研究李大钊思想的第一部著作,是李大钊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出版正值李大钊牺牲30周年纪念,在当时“起了宣传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2]832}。在思想观点、论述体系、资料范围、研究框架等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其基本观点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形成了国内研究者的共识,并在研究中被继承和发展。国外学者如前苏联的加鲁尚茨、美国的迈斯纳、日本的斋藤道彦和後藤延子也都参考和引用

过该著作。可以说,这部著作奠定了建国以后李大钊研究的基础,张先生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

第二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张静如先生在学术界为李大钊平反并倡导拨乱反正的阶段。文革一结束,张先生就“重操旧业”,在中共党史研究界率先为李大钊平反,进行了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张静如先生的《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蔑》一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历史功绩是“党和人民所公认的”,李大钊“始终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的榜样”^[3]。该文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学术界第一篇为李大钊平反的文章,在当时对于恢复李大钊的历史地位起了积极的政治导向作用。其后,张先生利用五四运动60周年、李大钊诞辰90周年的时机,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4]《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5]等文章。1979年5月在山东,作了《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学术报告,1979年7月又南下上海,作《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学术报告。张先生在文章和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开展李大钊研究的拨乱反正工作,积极宣传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要求学术界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与学术上的深化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提高李大钊研究水平的努力方向,为开创李大钊研究的新局面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1984—2004年。这20年是张静如先生是作为中国李大钊研究的指导者,全面地领导和组织全国的李大钊研究工作,而且是研究不断深化与拓展的阶段。1984年10月,由张静如先生主持的李大钊诞辰95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国内的学术大家和李大钊研究者,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李大钊研究走向繁荣的一次重要会议。1985年6月,在张先生领导下,成立了有众多李大钊专家参加的北京市李大钊研究会,张先生被推选为会长。张先生还积极参与全国李大钊研究会的筹备工作,1989年4月,被选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10月,张先生参与主持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

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就今后李大钊研究的科学性、史料的整理与文集的注释工作、专题性研究的路径、国外著作的翻译、中外学术交流、研究工作与宣传工作的结合、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培养等,提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6]。这之后,张先生参与组织了多次李大钊学术研讨会,如,1991 年 7 月的李大钊学术研讨会、1992 年 4 月的李大钊学术研讨会、1994 年 10 月的纪念李大钊诞辰 105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1999 年 10 月的纪念李大钊 110 周年学术会议。张先生还担任了《李大钊全集》(4 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顾问、《李大钊文集》(5 卷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 20 年间,张先生出版了《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等李大钊研究专著。在《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综述》《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进展》《李大钊与北师大》《李大钊对国共合作的贡献》《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李大钊论历史科学》等二十多篇李大钊研究文章,在李大钊文献的搜集与研究、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关系研究、李大钊与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大钊专题研究以及在开辟李大钊研究新领域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四个阶段:2004 年以来。这是张静如先生全面总结李大钊研究并不断地提升自己学术经验的阶段。张先生参与组织了 2004 年在唐山召开的纪念李大钊诞辰 115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以及 2009 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李大钊诞辰 120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张先生总结了前一阶段李大钊研究的业绩,提出了未来几年开展研究的重点问题。譬如,在 115 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张先生就今后的李大钊研究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希望继续挖掘材料,解决研究中不少推论性的观点;二是要在已开辟领域精耕细作,使研究工作走向深入;三是要不断开辟新领域,要有新的角度、多学科的研究^[7]。2004 年以来,张先生还发表了《论李大钊倡导的“求真态度”和“与时俱进”》《读懂李大钊》《关于〈李大钊致吴若男〉》《论李大钊的宽容精神》《从〈守常全集〉到〈李大钊全集〉》等研究文章,出版了 4 卷本的《张静如文集》及“续集”。在李大钊思想的发掘、新史料的解读、李大钊研究经验的总结等方面,为李大钊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张先生坚持不懈地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历程,是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历程,也是引领中国李大钊研究不断前进的历程。张先生在中国李大钊研究史上有着至高的学术地位,张先生无愧于中国李大钊研究领导者、组织者的称誉。

二、李大钊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张静如先生是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中国李大钊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李大钊研究领域,张先生身体力行、奋力开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李大钊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李大钊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张先生是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受业门生,治学尤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奠定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开创者地位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基本史料之搜集、重要资料之征引方面,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是极为少见的。为了写好这部著作,张先生在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查阅、抄录李大钊的文章,又从北京市委档案馆借出和抄录了李乐光在解放前收录的部分李大钊文章。这样,张先生搜集到三百多篇李大钊文章以及李大钊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土地与农民》等著作,从而奠定了该书的资料基础。即使是 1959 年《李大钊选集》出版后,张先生这部著作所提供的史料,仍然是一般研究者难以直接看到的。文革结束后,张先生提出要在李大钊研究的史料上下功夫。他认为,当时的李大钊研究是“史料的挖掘不足,又缺乏必要的考证,即使有史料,也不能完全实事求是地运用”^[5]。1979 年,张先生等从 1924 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俄文记录中,发现了李大钊以秦华的名字所作的关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报告,这对于研究 1924 年李大钊在苏联的活动及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84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先生与马模贞等编著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是年谱性质的资料长编,该书一方面按时间顺序照录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又加以简要的概括性介绍,这是 1989 年《李大钊史事综录》出版前最为翔实的李大钊研究资料集,在李大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应用上有突出的贡献。张先生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地使用史料,反对写文章时不顾史料而“有意隐讳”,更反对“把错误的东西硬写成正确的”,他鲜明地指出:“把李大钊同志一生的曲折写清楚,说明他

怎样在探索中前进,既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既有卓越贡献,也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并在斗争中不断得到纠正。这样,再现出来的李大钊同志的形象就使人感到是可信的伟大历史人物,从而无限尊敬,起到教育的作用。反之,描写成完人,即使可敬却无法学习,又怎么起教育作用呢?而且被人发现其中掺假,岂不是真正损害了李大钊同志的形象吗?我看,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实事求是地处理史料不会有坏处。”^[5]张先生不仅注重挖掘李大钊研究的新材料,而且善于对这些新材料加以解读。譬如,近年来发现了一封李大钊致吴若男的信件,张先生对这封信全文予以公布,并经过考证后认为此信应该“写于1923年3月至4月间”^[8]。张先生对李大钊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为李大钊研究的深化奠定了资料基础,对青年学者研究李大钊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李大钊生平活动的研究。张先生研究李大钊,注意对李大钊的生平活动进行深入考察,从而展示李大钊活动的历程。譬如,张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文中,通过对李大钊在辛亥革命后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率先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组织中国共产党、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论争、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领导北方革命运动、最后为革命英勇献身事迹等等的全面考察,得出结论:“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4]又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了《李大钊对国共合作的贡献》一文,对李大钊参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促进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反击右派分裂行径、巩固国共合作局面的历史活动作出了客观的叙述,凸显了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具体侧面,提升了人们对于“李大钊与国共合作关系”的认识。张先生针对人们很少知晓李大钊与北师大关系的情况,依据第一手资料撰写了《李大钊与北京师范大学》^[9]一文,梳理了李大钊在北师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促进图书馆教育的发展等史实,为人们提供了认识李大钊在高校活动的一个新视角。学术界有人认为李大钊在刑场上发表了演说,有的专著甚至还写出李大钊演说内容:“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

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对此,张先生在《李大钊临刑前没有发表演说》^[10]一文中,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证否定了长期以来流传的这种说法,这对李大钊生平活动的研究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第三,李大钊思想体系的研究。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是李大钊研究的重要方面。作为思想家的李大钊,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体系。研究李大钊的思想特别是李大钊的革命思想,是张先生从事李大钊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张先生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在学术界第一次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析,对李大钊在《言治》月刊和季刊、《甲寅日刊》《晨钟报》《宪法公言》《新青年》等刊物上的文章一一解读,对李大钊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阶段的思想给以较为详尽的描述并分析其思想转变的因素,对李大钊在建党后思想的前进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建党以后“大钊同志的革命思想在其成熟的程度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的阶段、革命的前途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问题,都达到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了启蒙的作用”“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逐步成熟,作了必要的准备”^[11]。在《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一文中,张先生认为应该以1918年下半年作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其理由是:李大钊自1916年开始“就力图用辩证和唯物的观点去观察宇宙,分析问题”,到1918年上半年“已经初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李大钊“对于进化论的怀疑和否定,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阶级论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李大钊“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成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因素^[12]。张先生关于李大钊思想演变历程及思想转变的研究,清晰地再现了李大钊思想变动的轨迹和特色,这在国内李大钊研究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在《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中,张先生提出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提高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深度,主张加强比较研究的力度,并提升到规律研究的层面,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揭示李大钊思想的丰富内涵。他指出:“必须研究李大钊所处的社会背景,综合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

的社会条件;还需要研究与李大钊同时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贡献和革命实践,进行比较,找出他们思想上的一致和差距;同时,还应该了解‘五四’前后各种思想流派的发展状况,研究马克思主义中一些思想流派的关系和斗争;把李大钊研究,纳入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围,纳入总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发展规律的范畴。在方法上,可以有计划地分工进行专题研究,譬如,关于李大钊思想方面,可以分头研究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史学、法学、文艺、新闻等专题。”^[13]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的李大钊思想研究具有引领性的意义,对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深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第四,李大钊研究史的研究。张静如先生对于李大钊研究史高度重视,他通过撰写一系列的李大钊研究综述文章,梳理李大钊研究的历史。张先生于 1979 年曾作了《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介绍过去多年来对李大钊同志研究的情况”,从十个方面总结自 1927 年到 1979 年五十多年来李大钊研究的具体进展,认为在有关李大钊回忆录的搜集、李大钊生平思想研究、李大钊研究资料收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还特别提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认为“此书对李大钊同志研究很仔细,提供了不少材料”^{[14]59-61}。1985 年,张先生与马模贞合作发表的《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就建国 35 年来李大钊著作的编辑整理、佚文的搜集、校勘、年谱的编辑,李大钊生平活动研究及史实的考证,李大钊研究专著的出版,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各方面成果,李大钊研究工作中遵循的思想原则、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作了较为全面而又细致的分析^[13]。从 1984 年到 1989 年的五年间,中国的李大钊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就此,张先生与他的博士生侯且岸撰写了《1984 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此文是《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的续篇),就 1984 年至 1999 年李大钊的研究情况进行述评,认为五年来李大钊研究的主要成绩是:重视李大钊早期思想和活动的研究,加强了对李大钊在北方地区革命活动的

研究,李大钊思想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宽,李大钊研究的史料得到挖掘和整理,国际交流的局面打开了。但存在着“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科学的轨道,感情色彩比较浓”。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工作还不够,如“百余万字的《李大钊文集》没有注释”。李大钊研究有许多空白,“我们对李大钊与现代历史重要人物、社团、刊物、思潮之间关系的专题性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有质量的论文少得可怜”。李大钊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虽已开展,但“这些工作仅仅是刚刚起步”。李大钊研究工作与宣传工作脱节,“我们的宣传基本上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大体上相当于 50 到 60 年代的水平”。关于研究的队伍,“在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学术队伍构成方面,实有青黄不接的征兆”^[15]。张先生还撰写了《从〈守常全集〉到〈李大钊全集〉》^[16],对李大钊著作搜集与整理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再现了李大钊著作搜集与研究的历程。需要说明的是,在李大钊研究的学术会议上,张先生一般都会在会议总结时就过去的李大钊研究历程予以新的阐述,希望学术界重视李大钊研究史的研究。笔者记得,在 2005 年纪念李大钊诞辰 115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张先生郑重提议学术界努力撰写一部《李大钊研究史》,使研究工作在高起点上进行。正是在张先生的倡导和指导下,笔者撰写了《李大钊研究史(1927—2004)》一书,将张先生关于^①李大钊研究史的主张付诸实践,算是部分地完成了张先生交代的任务。

第五,李大钊研究新领域的开辟。为了推动李大钊研究的不断深化,张静如先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就着力开辟李大钊研究的新领域。笔者体验最深的,概括起来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方面开辟了以下三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其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其历史地位很大一部分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联系起来的。因此,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成为李大钊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张静如先生研究李大钊一开始是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发展,他的成名作《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重点研究和解决李大钊如何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

^① 参见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3—426 页。《李大钊研究史(1927—2004)》是该著“外二种”中之一。

转变的问题。由此,张先生开辟了“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予以关注和研究。1979年,张先生到上海的历史学会作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学术报告,在讲到“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问题”时,认为不能以宣传十月革命作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讲好话的也有不少人,因此根据这个标准是不行的”,而应该看“是不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如果是,就说明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张先生看来,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这三篇文章,确实是宣传了十月革命,但又不仅仅是宣传十月革命,而是表现出新的思想状况。这三篇文章在内容上,一是“反映了李大钊同志已经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二是能够“看出李大钊同志对民主主义赋予了新的含义”;三是“把中国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潮流联系起来”,因而“这三篇文章标志李大钊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17]。这之后,张先生围绕“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在《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没有错》的文章中,张先生说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前也是民主主义者,“是经过慎重的思考,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救国,并不是赶时髦”。而且,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妨碍思想启蒙,而是一种新的启蒙,“这种启蒙比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启蒙深刻得多,实际得多,有用得多”。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因为最初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18]。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文章中,张先生就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与确立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指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同时,“李大钊在革命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认真的、深入的思考,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理论”^[19]。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中,张先生指出,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树立的过程中,就引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言,有独特的表现:一是李大钊“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理论,即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上的严密性和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普遍指导意义”;二是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过程中对非马克思主义者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表现出少有的宽容态度”;三是李大钊“利用在图书馆工作之便,较早注意引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资料,又利用在学生中的广泛影响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言,李大钊一开始就意识到“主义”的运用应“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而有所不同,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提出了中国“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的观点^[20]。对于“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领域,张先生有过总结性的展望,认为这个领域就是要重点研究“李大钊引进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树立的关系、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关系”,从而确立李大钊是“在中国树立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倡导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一人”的观点^[21]。张先生开创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至此,许多学者在研究李大钊时都很注意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

其二,李大钊学术思想。张静如先生在学术界最早倡导开展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研究。1979年10月29日,张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的工作水平》,叙述了文革和文革后李大钊研究的状况,指出研究中史料挖掘不足、分析不实求是而过于简单化的缺点,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该文发表后,在国内外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对此后的李大钊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4年,张先生在《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进展》中,强调要加强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研究,指出:“可以分头研究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史学、法学、文艺、新闻等思想。”^[22]1990年,张先生在《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中又说:“李大钊不仅是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学术成就却极其辉煌。他对哲学、历史、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法律等众多领域均有所涉猎,诸多创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拓荒者的作用。因此,全面地整理和总结李大钊的思想文化遗产,是李大钊研究的重要内

容,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6] 张先生还发表《李大钊论历史学》文章,对李大钊的史学展开全新的研究,就李大钊关于“历史”概念的界定、建立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与哲学的关系、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的关系、史学的功能等问题作了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3]。在张先生的倡导下,学术界对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笔者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对李大钊的学术思想曾予以系统地研究,将李大钊作为一位学者、教授、文化人进行研究,完成了《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博士论文,后经过修改正式出版^[24]。

其三,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关系。张静如先生在中国最早倡导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共党史人物,主张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应该考察其对被动社会现代化转变为主动现代化过程的贡献。1989年,张静如先生发表《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25]文章,考察了李大钊现代化意识的具体表现,指出李大钊“是现代化意识的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该文提出“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并分析了李大钊思想中非现代化意识的缺陷。因此,此文在李大钊研究史上,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了李大钊研究的新思路,对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张静如先生还在《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26]中指出,李大钊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是引进和传播现代化意识形态最高层次马克思主义,并培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代精英;二是创建新的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为其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一定地位创造条件而努力;三是促成、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四是为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献出了生命。在张静如先生的倡导下,开辟出“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领域。张先生1999年发表文章,就“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系统地提出自己的基本主张和设想: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也应该认真研究。中国被逼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但由于长期处于被动状态而导致社会发展极其缓慢,从而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以摆脱被动状态的斗争持续不断。李大钊生活的年代,处于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转折期。因此,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李大钊在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李大钊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李大钊关于政治民主化的观点,李大钊关于建立现代化法制的观点,李大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结合的观点,李大钊关于教育现代化的观点,李大钊关于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观点,李大钊关于图书馆现代化的观点,等等。像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建立中国第二个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在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在以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现代化事业必须有现代化政党的领导,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可见,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个广阔的研究领域。”^[21]

张先生在规划“李大钊与社会现代化关系”这一领域而提出上述系统的观点时,笔者正在张先生门下以李大钊为研究方向攻读博士学位,因而有幸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聆听先生的教诲。笔者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发表了“李大钊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系列论文,如《论李大钊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早期李大钊对启动中国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思考》《李大钊与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等,最终完成了一百三十多万字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①一书。张先生开辟李大钊研究新领域的努力,不仅使李大钊研究在范围上、深度上有重大的突破,而且也促进了学术界在开辟新领地方面的努力,这对李大钊研究的深化与提高有着长远的意义。

第六,推进李大钊研究的国际交流。张静如先生作为中国李大钊研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仅积极推进李大钊研究的国内交流,使全国的李大钊研

① 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究组织起来,而且以国际化的视野看待李大钊研究。早在1979年的纪念李大钊诞辰90周年期间,张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从李大钊研究中外比较的角度,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最近接触一点外国学者研究李大钊的成果,就更感到我们工作的落后。在国外,这方面工作进展较大的是日本、苏联和美国。他们已出版的,有论文、有专著,也有资料方面的整理。如日本学者丸山松幸、斋藤道彦合编的《李大钊文献目录》,把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编的几个著述年表综合起来,加上《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各种期刊目录部分所见之李大钊同志的文章,总共收集著译文目录433篇。工作很细致,令人佩服。说实在的,这个工作并不甚难,尤其是我们做起来较之日本学者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就是无人去做。再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是一本研究李大钊同志思想的专著。它对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分析得很细腻,特别注意反映其思想中有特色的东西,使人看后颇有启发。……从这两本书的情况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5]1984年在河北乐亭召开了李大钊诞辰95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张先生支持和邀请下,日本著名的李大钊研究专家后藤延子教授到会并作了《三个影响李大钊的日本人》的学术报告,李大钊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得以启动。1985年,张先生在学术界郑重提议:“在当前国际学术交流频繁的情况下,理由我们发起,邀请国际上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专家,一起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使李大钊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研究专题,借以广泛组织力量,扩大影响,同时,积极发展同各国人民文化上的友好往来。”^[13]在张先生的倡议下,1989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李大钊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谢宁、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加鲁尚茨、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斋藤道彦、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后藤延子、蒙古党中央社会科学院学术秘书达木丁·苏伦、捷克查理大学哲学系亚非教教室主任库白什娃等出席。就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张先生在发言中提出要有计划、有目的地翻译和评介国外的李大钊研究

学术著作,加强李大钊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6]。在张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其后的李大钊研究的重大学术会议上,都有外国学者的身影;同时,国外的李大钊研究著作,如美国学者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日本学者后藤延子的《李大钊思想研究》等著作相继翻译出版。张先生利用其学术影响将李大钊研究推向国际学术界,扩大了中国李大钊研究的国际影响,推动李大钊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

第七,培养年轻一代的李大钊研究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张先生为使李大钊研究能够持续推进、后继有人,把培养年轻一代的李大钊研究学者作为自己的任务。在《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中,张先生指出:“目前,从国内学术界的基本状况来看,在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学术队伍构成方面,实有青黄不接的征兆。我们接触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大多出自中老年同志之手,年轻同志的有一定分量的文章不多。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加强对年轻同志的帮助和引导工作,以便他们尽快地在学术上成熟起来。”^[15]记得,在1989年的全国李大钊研究学术研讨会期间,张先生与刘桂生、彭明、吴家林、马模贞、韩一德等李大钊研究专家,曾利用一个晚上的机会集中40岁以下的年轻人开会,就李大钊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研究方法、资料运用等对青年人进行现场指导,有不少青年研究者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得到指导而成长起来的。1994年,在唐山召开的纪念李大钊105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分组会议中,大会安排青年学者担任各组的学术秘书,并由青年学者夏晓明、吴汉全、周忠瑜、张伟良分别向大会介绍四个小组学术交流情况,这是给青年研究者提供锻炼的机会。会议期间还专门召开青年学者座谈会,张先生与王学珍、古平、刘桂生、朱成甲、韩一德、吴家林等老一辈专家现场解疑析难,为青年学者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①。张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多个研究方向,但李大钊研究是其中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张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中,吴汉全、张春丽、李强等都是以李大钊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张先生的博士生朱志敏、侯且岸等也是以李大钊研究见长的,其他博士生也有不少是以

① 参见朱文通《纪念李大钊诞辰105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唐山市召开》《李大钊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纪要》,载《李大钊研究》第5辑,1995年。

李大钊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此外,还有一批因为从事李大钊研究而成为张先生的“编外弟子”。在当今的中国李大钊研究界,李大钊研究的“少壮派”大都出自张门,并且在李大钊研究界非常活跃,学术成果也十分丰硕。张先生培养年轻一代李大钊研究专家的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这对于李大钊研究在承继既有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有着突出的意义。

张静如先生在李大钊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是与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勤奋治学、学术唯真的孜孜追求与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尤其是与先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分不开的。先生在 1981 年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是无穷的。它一经与实践结合,就会发出巨大的威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赢得了胜利,也必将成为新的建设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引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共产主义迈进。中国如此,世界亦然。还是李大钊说得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7]笔者感受最深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景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切的追求,是先生一如既往地从事李大钊研究的精神动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先生从事李大钊研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将宏观的学术视野与微观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表现出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对接、问题与学理相关联的学术风格。“大处着眼”体现出观念创新,思想解放,注重前瞻性规划,致力于重大领域的开辟,重视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小处入手”表现为求真务实,强调研究中的具体实证,讲究立论的有据可查、结论的切实可靠。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独特的学术研究路径,这也许是张先生能够对李大钊研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重要原因。

三、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思想

张静如先生在李大钊研究的学术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思想。笔者自 1989 年起追随先生从事研究李大钊工作已有 20 多年了,其间又于 1999 年至 2002 年在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因而对先生在李大钊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体会较深。然而,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恢弘豁达、气度非凡,笔者限于识力与见闻,难以窥见其全体、领略其精髓,只能就先生在李大钊研究方面的学术思想简单地罗列

以下几点。

1. 知世论人、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张先生强调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构建社会史观。因此,先生研究李大钊也是以其社会史观为其鲜明特色,强调“知世论人”的学术研究传统,主张将李大钊放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之中研究。譬如,张先生对于李大钊生平活动的研究,提出这样的主张:“关于生平活动方面,可以研究其与某些人物的关系,如孙中山、陈独秀、邓中夏、钱玄同、高一涵、章士钊、冯玉祥、白坚武等;也可以研究其与事件的关系,如五四运动、二七罢工、国共合作、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等;还可以研究其与某些团体组织的关系,如中国社会党、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党的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共产国际、国民军等;又可以研究其与各种思潮的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三民主义等。”^[22]又譬如,先生为拙著《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所作的“序”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李大钊的主张,指出:“‘以社会史为基础’,就是要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出发,将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考虑到当时社会状况对研究对象所构成的种种影响。……我这几年组织了一批学者从事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其最初的出发点是能为中共历史研究(包括中共历史人物研究)提供基础,使研究者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推动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入。研究李大钊也是这样,至少需要对晚清至 1927 年间的中国社会有较为深刻的把握,不然也就无法理解生活在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中的李大钊。”张先生主张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研究李大钊,因而积极地倡导实事求是良好学风,力求使研究结论切合历史实际。关于实事求是运用史料问题,张先生指出,打倒“四人帮”后,一些研究者力图“再现李大钊同志的形象,但是违背科学性的情况仍然没有完全消失”,“如把李大钊同志关于实现革命群众联合的思想说成是来源于毛泽东同志的《民众的大联合》,这就很勉强”;有的研究者为了说明李大钊《土地与农民》的正确性,“总要强化文章的观点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致,

强调李大钊同志是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起”^[5]。张先生指出,在研究工作中“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好百好。对于李大钊同志也应该是这样。李大钊同志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制,主张共和,鼓舞青年,但也有过起伏。……1918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同时也还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28]知世论人,实事求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研究历史人物,是张先生研究李大钊最为突出的治学精神,这也成为张门弟子学术研究的鲜明特色。

2.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研究理念。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方面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绩,除了他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勤于搜集资料、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外,很重要的是他具有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研究理念,善于针对现实、联系实际地把握李大钊研究的方向,从而不断地将李大钊研究推向新的境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先生根据中国社会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事实,从现实与历史相对接的思路,将“现代化”这一时代的理念融入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提出要研究“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并在学术界率先发表《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等文章,开辟了李大钊研究的新领域。世纪之交,“创新意识”、“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先进文化”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张先生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及思想理论发展所提出的新理念,发表《论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①、《论李大钊倡导的“求真态度”和“与时俱进”》^②等文章,这正体现了张先生一贯倡导的“研究现代历史人物应该寻找一个角度,把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同现实结合起来”^{[2]735}的学术理念。张先生发表的《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没有错》^③、《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

路》^④、《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⑤等文章,也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的代表性著作,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张先生认为,研究李大钊要具有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研究理念,就需要“强化理论思维”。他指出,“研究李大钊,自然也需要理论思维”,如此就需要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研究中去。譬如,当前的先进文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观等,都要加强学习,深刻领会,这对深化研究工作很有用处。……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年轻人,可以在理论学习上下点工夫”。自然,张先生强调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研究理念也是有具体要求的,他说:“当然,要求李大钊研究者能够‘推陈出新’,也不是无根据地求‘新’,不是追求时髦之‘新’,而是要有扎实的研究、理性的反思,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求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以不断推进李大钊研究的进步。”^[29]张先生积极倡导的及在研究中努力贯彻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理念,不仅使张先生几十年来研究李大钊有不断的创获,而且在研究理念创新方面也有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李大钊研究界的不断前进。

3. 学科交融、视域宽广的研究视角。张静如先生在李大钊研究的视角上,强调多学科、宽领域、厚基础,主张打破现有学术壁垒,在更为宽广的视域中再现历史的、真实的李大钊。张先生本人是以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起家的,但他不局限于李大钊“革命思想”研究的范围。1979年,张先生在一次报告中指出,“他(李大钊)博学多才,不仅领导革命工作,而且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各方面都有研究”,而我们“从各个角度去研究也很不够”^{[14]63}。在张先生看来,李大钊是革命家、思想家,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有重要的研究和指导;李大钊又是“名重当世”的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

① 载《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② 载《北京党史》2004年第6期。

③ 载《北京日报》,1989年11月3日。

④ 载《李大钊研究》第2辑,1992年。

⑤ 载《北京党史》1999年第6期。

域有重大的开拓;同时,李大钊又具有报人的身份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与当时的报刊、社团、要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李大钊就应该从多层面、多角度来进行研究。张先生十分强调要从多角度来研究李大钊,主张在多角度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指出:“李大钊同志不但研究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而且在哲学、经济、宗教、历史、教育、文学等学术领域中也有不少理论上的建树。所以,要完整地、了解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和实践,就必须从不同角度加强研究。……如能分头研究,然后再加以综合,定有更大成效。”^[5] 张先生在给笔者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所作的“序”中,进一步强调学科交融、宽广视域的极端重要性:“研究李大钊要做出点成绩来,不是仅仅研究与李大钊相关的材料就能做到的,必须熟悉相关的领域。就是说,李大钊研究者不能固守在李大钊研究之中,那样是很难产生出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我觉得,研究者除了要求其知识的深度以外,也应把知识的广度亦即知识结构作为要求。具体到李大钊研究而言,单有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的一些知识,是不能满足研究工作需要的。研究者需要更新知识,尤其要调整知识结构,多多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方面补课,这对李大钊研究的深化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推进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李大钊,张先生还提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具体要求。张先生指出:“从微观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力求充分阐明李大钊的思想,是怎样加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他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留下什么痕迹”;“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通过李大钊研究,对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概括。譬如,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有什么特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里,运用人类最先进的宇宙观有什么障碍和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斗争,有什么经验教训,等等”^[13]。张先生提出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李大钊,对于进一步从多学科、多视域

研究李大钊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4. 加强基础、还原本真的学术追求。张静如先生认为,研究李大钊所要求的学科交融与宽广视域,是以厚重、扎实的研究基础为前提的。因而,张先生多次重点强调“加强基础”的意义,以便达到研究工作能够“还原本真”的目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张先生就批评学术界在李大钊研究上“力求把李大钊同志描绘成完人”的错误,认为一些学者虽然力图“再现李大钊同志的形象,但是违背科学性的情况仍然没有完全消失”,研究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满足于简单化的结论”,要求学术界“把李大钊同志的一生的曲折写清楚,说明他怎样在探索中前进,既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既有卓越贡献,也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并在斗争中不断得到纠正。这样,再现出来的李大钊同志的形象就使人感到是可信的伟大历史人物”^[5]。这体现了张先生研究李大钊在于“还原本真”、探求真知的学术追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张先生提出的“加强基础”主张,就是要求研究者掌握李大钊的全部或接近全部的著作,掌握有关李大钊生平的大量的、准确的材料。为此,张先生提出要编一部《李大钊生平史料汇编》,即把已发现的与李大钊生平活动有关的第一手材料,汇集一起,按年代顺序编辑,尽可能保持资料的完整性,以供研究者使用;要编一部《李大钊文集评注》,评注不只是作小量的名词解释,而应包括人物、事件的解释,思想、观点源流的考察,全文或论点的历史背景的说明,疑点的考证,文章作用和影响的评论,等等。在世纪之交,张先生在“加强基础”方面着力提出要“读懂李大钊”,并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要通读并熟悉李大钊的著述”,二是“要读懂李大钊的著述,特别是文言文”,三是“要弄清李大钊所写每篇文字的历史背景”^[30]。张先生在为笔者《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所作的“序”中,提出“多读还要与多写结合起来”,强调“读多了自然会加深理解,不懂的也就会逐步弄懂了”,而“多写”也“能够加深对史料的理解,提高对史料的运用能力”。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中强调研究工作的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但始终重视基础性的工作,从不发表没有根据的言论,对既有的学术观点抱有谨慎对待的态度,力图再

现历史的、真实的、可感的李大钊形象,这是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中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

5. 总结得失、不断开拓的治学风格。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中具有强烈的“总结”意识,他在每一重要的时段都要总结前一阶段研究工作的得失,使李大钊研究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开拓前进,从而将李大钊研究不断推向新的境地。“文革”结束后不久,张先生即在学术报告中指出:“李大钊同志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当时的李大钊研究“总起来看,水平不高,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对他的思想活动研究不深,对他在党内一些活动也是若明若暗。从各个角度去研究也很不够。……现在的情况是: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我们没有把他完整的形象再现出来。全面评价很不够,形象的东西更少。”^{[14]63}在《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中,张先生也是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研究工作,认为李大钊研究在史料的挖掘、史料的使用、分析研究方面有明显的不足。在《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进展》^[22]这篇论文中,张先生对1979—1984年5年间中国李大钊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回顾,概述和评价了新近出版的《李大钊文集》、《李大钊年谱》、《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新近发现的李大钊的文章,以及朱成甲发表的《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等文章和吕明灼撰写的《李大钊思想研究》专著。1985年张先生和马模贞合写的《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的论文,就李大钊著作的编辑整理、佚文的搜集、校勘、年谱的编辑,李大钊生平活动研究及史实的考证,李大钊研究专著的出版,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各方面成果,李大钊研究工作中所应遵循的思想原则、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概括^[13],从而对建国35年来李大钊研究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1990年张先生与侯且岸合作的《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综述》文章,认为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取得重要的进展,但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科学的轨道,感情色彩比较浓”;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工作还不够,“百余万字的《李大钊文集》,没有注释”;李大钊研究有许多空白,“我们对李大钊与现代历史重要人物、社团、刊物、思潮之间的关系的专题性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有质量的

论文少得可怜”;李大钊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得到开展,但“这些工作仅仅是刚刚起步”;在李大钊的研究与宣传问题上,“我们的研究跟不上”,“我们的宣传基本上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大体上相当于50到60年代的水平”;“在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学术队伍构成方面,实有青黄不接的征兆”^[15]。张先生总结李大钊研究工作的得失,主要在于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克服研究中的盲目性、简单化和炒冷饭现象,找出李大钊研究新的空间与新的路径,使研究工作走上理性的、自觉的道路。因而,张先生特别注重对李大钊研究的“规划”与“设计”,指明李大钊研究的发展方向,强调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开拓前进。譬如,在《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文章中,张先生当时提出了三方面的努力目标:一是加强史料的挖掘,进行必要的考据。要求必须下工夫去解决史料,“否则很多事情说不清楚,或者自以为说清楚,其实是错的,这又怎么能再现李大钊同志的形象和给予正确的评价呢?”二是实事求是地运用史料,增强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认为不能实事求是地运用史料,“在李大钊研究工作里也有很多的反映”;三是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要注意研究李大钊的“思想脉络、渊源、特点”,特别是思想中“矛盾的东西”^[5]。又譬如,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大会上,张先生就“继续努力”问题讲了三层意思:一是要继续努力挖掘李大钊的著述和活动史料,二是要努力提高研究的质量,三是要加强学术交流,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学术交流^[31]。张先生在李大钊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总结得失、不断开拓的治学风格,也是张先生学术研究的显著特征,对于引领中国李大钊研究的不断前进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张静如先生是中国李大钊研究的重要开创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处于中国李大钊研究的领导者、组织者地位,在身体力行地开展李大钊研究、培养李大钊研究的后备队伍、建立全国性及地方性的李大钊研究组织、规划李大钊研究方向、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引领李大钊研究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今天,中国的李大钊研究处于强劲的发展态势,与张先生一生的辛勤开拓与组织领导是分不开的。张先生为李大钊研究留下了一

份厚重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并使之发扬光大。这应是对张先生的最好怀念。

参考文献:

- [1] 吴汉全. 张静如与中国的李大钊研究:写在张先生七十华诞之际[J]. 中共党史研究, 2003(1).
- [2] 张静如文集:第 3 卷[M].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827.
- [3] 张静如. 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N]. 光明日报, 1978-02-16.
- [4] 张静如.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N]. 人民日报, 1979-05-03.
- [5] 张静如. 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N]. 文汇报, 1979-10-29.
- [6] 侯且岸,姚鸿. 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和今后的发展[M]//李权兴. 李大钊研究辞典. 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4:990-991.
- [7] 吴汉全. 纪念李大钊诞辰 115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5(2).
- [8] 张静如. 关于《李大钊致吴若男》[J]. 北京党史, 2011(3).
- [9] 张静如. 李大钊与北师大[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4(6).
- [10] 张静如. 李大钊临刑前没有发表演说[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1(2).
- [11] 张静如. 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 [12] 张静如.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M]//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13] 张静如,马模贞. 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J]. 近代史研究, 1985(2).
- [14] 张静如. 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研究中的一些问题[M]//张静如文集:第 1 卷.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
- [15] 张静如,侯且岸. 1984 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J]. 河南党史研究, 1990(1,2 期合刊).
- [16] 张静如. 从《守常全集》到《李大钊全集》[J]. 北京党史, 2007(2).
- [17] 张静如文集:第 1 卷[M].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71.
- [18] 张静如. 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没有错[N]. 北京日报, 1989-11-03.
- [19] 张静如,侯且岸.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J]. 李大钊研究:第 2 辑, 1992.
- [20] 张静如,朱志敏.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旗帜在中国的树立[J]. 北京党史, 1999(6).
- [21] 张静如. 关于李大钊研究[J]. 史志研究, 1999(4).
- [22] 张静如. 再促李大钊研究工作的进展[J]. 研究·资料与译文, 1984(3).
- [23] 张静如. 李大钊论历史学:重读《史学要论》[J]. 历史教学, 1989(11).
- [24] 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5] 张静如. 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9(6).
- [26] 张静如. 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J]. 北京党史研究, 1994(6).
- [27] 张静如,王章维.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J]. 齐鲁学刊, 1981(4).
- [28] 张静如. 关于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研究中的一些问题(1979 年 5 月)[M]//张静如文集:第 1 卷.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65.
- [29] 张静如.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序[M]//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 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
- [30] 张静如. 读懂李大钊[J]. 北京党史, 2009(6).
- [31] 张静如. 李大钊诞辰 120 周年纪念:可喜可贺,继续努力[J]. 北京党史, 2010(1).

(责任编辑:白丽娟)